

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快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建设

□ 余红辉

核心阅读

在中国版图上，有这样一片区域，它形似巨龙腾飞，支撑起全国超45%的经济总量、涵养着超过四成的人口。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构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新引擎，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决策部署。

增强紧迫意识，加快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建设

近年来，国家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不容忽视，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区域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仍然存在。因此，建设污染治理主体平台，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共抓大保护体系尤其重要。

建设主体平台是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长江经济带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重要前提。长江经济带要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建设主体平台，有利于凝聚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全流程系统生态安全为目标参与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够更好地协调不同机构、不同产业模块之间的矛盾，保障各方力量能够共享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和收益，从而能够更大幅度地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流域生态系统自身容量，全方位推进长江经济带污染防治。

建设主体平台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其中生态环境改善对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长江经济带作为贯穿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新跨越”的重要经济带，其在区域发展

总体格局中举足轻重，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长江流域40年来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成为现阶段制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这就迫切需要建设好主体平台，牵头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污染治理，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的系统性出发，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树立区域“一盘棋”的思想，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整合相关资源，找准长江病根，治好长江病，切实提高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水平，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建设主体平台是破解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重点难点问题的重要抓手。当前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一直处于“小、散、乱”的旧局面，治理效率低下，部分生态修复工程开工率不足，资金有效使用率不高，缺乏有效的支付模式，沿江水环境治理、矿山整治和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资金收支平衡。建设污染治理主体平台，能够聚集广大的社会资本、优秀技术，借鉴国内外大江大河治理的成功经验，高效快速地集中优势资源解决污染防治的低效率问题。此外，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尚未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网络监测系统混乱，“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问题突出，导致数据来源多头，监测数据不统一，直接影响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主体平台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实现数据共享和兼容，提高决策效率。

强化使命担当，有效提升主体平台协同和长效治理水平

主体平台在长江经济带污染防治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必须担负起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历史责任。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思想行动自觉，建立健全生态协同保护和长效治理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资源整合功能和专业优势，探索打造系统、精准、长效的治理模式，有效提升流域污染治理水平。

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益协同和长效治理机制。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一方面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承载力为生态红线，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地区资源开发与产业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优势。另一方面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提高各方力量参与跨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在产业转型升级、环境保护资金和技术投入等方面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生态环保企业的专业优势，构建起一个权责分明且富有合作弹性的长江经济带跨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体系。

做好顶层设计和综合服务整体推进污染防治。发挥主体平台的统领作用，对沿江11省市地区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按照“一城一策”“一域一策”的原则，制定符合本区域生态特点的环境综合治理方

案。方案既要以环境质量提升为目标，又要兼顾经济发展水平，既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价值，又能给当地民众带来清新文明之风，寻求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最优解”。

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智能化方式，实现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充分发挥主体平台的专业优势，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先进通讯技术，构建信息交流平台和参与平台，实现流域生态状况、环境治理、污染排放和宏观经济数据共建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为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污染治理水平。充分发挥主体平台的创新优势，对于水环境治理、黑臭水体、农村生活垃圾等目前收支不平衡的污染治理领域，牵头打造更接地气、更易操作、更加适用的商业模式，摒弃以经济快速增长为导向的价值观和牺牲绿水青山换取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多方资源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发挥金融融通整合优势，提升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合理利用政府引导资金，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领域，提升长江污染治理的投融资能力，推动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升级。发挥主体平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有效整合国有环保资产，提升环保产业集中度，尤其是分散在各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环保领域的各类资产，打造世界一流的国家级旗舰类环保企业，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

加大科研投入，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技术全覆盖。充分利用主体平台上的技术研发资源，针对长江经济带整体性保护不足、累积性风险加剧、碎片化管理乏力等问题，加大固危险废弃物、重金属治理、黑臭水体、生物多样性、高浓度工业废水等重点难点领域的投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理长江经济带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排放，彻底解决点源污染，有效降低面源污染，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绿色低碳转型。



（上接1版头条）

建设监督与被监督的良性、积极关系，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监督和被监督只是法律上、工作中分工不同、职能不同，但目标是共同的，赢则共赢、败则同损。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来引领检察工作，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开展法律监督工作，使法律监督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发挥促进和保障执法司法机关更全面更深刻理解法律、共同履行好职责的作用，共同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推进新时代法律监督全面发展，使强项更优、把弱项补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内外都很关注检察工作如何创新发展。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要牢牢把握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全面适应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新要求，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这条主线，坚持检察业务、检察队伍、检务保障一体建设，坚持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并行，推动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相对薄弱环节明显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更加完备。

坚持以办案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实现监督与办案有机统一。办案是硬道理。离开办案，法律监督就不能落地。要立足办案促改革、谋发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办案品质和层次。正确认识监督与办案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把监督寓于办案中，把办案作为监督的基本手段，不断提升法律监督实效、维护法律监督权威。突出加强典型案例总结、指导和运用，通过办理有社会意义、法律

意义的典型案例，教育影响社会面，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准确把握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的检察改革新格局。全面推进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原则为指导，真正体现以办案为中心，把法律监督进一步落到实处，综合考虑提高办案质量效率、强化内部监督制约、落实司法责任制以及与侦查、审判、纪检监察、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衔接等各方面因素，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内设机构。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统筹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九大部署的改革任务，在“四梁八柱”已经落地基础上搞好“精装修”，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以审判为中心的本质是以庭审为中心，以庭审为中心的本质是以证据为中心”的要求理解深、落实好。

落实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加强政治素质、业务素质 and 职业道德素质建设。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要敏感于自己的不足、短板和弱项，只有“五个过硬”，业务能力更强、综合素质更高，才能有力、有效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要坚持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把讲政治落实到具体检察工作中。检察官不能只做司法办案的“工匠”，更要努力去做推进、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大师”。要着力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紧紧围绕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推进检察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弘扬新时代检察职业精神，践行“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抓紧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党的检察事业持续健康不断发展。

（上接1版二条）这三种境界就是读书学习的完整过程。要努力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克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做到融会贯通、精益求精。要由表及里地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从繁杂问题中发现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倾向性，从偶然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必然性，把表象的感觉具体化；要由浅入深地思考，反复读、仔细品，对照读、比较思，把感性的认识理性化；要由此及彼地思考，善于用辨证的思维、联系的方法，搞清来龙去脉，理清前因后果，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零碎的认知系统化。

有“明辨之”的清醒清醒，做到学以厚德。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读书学习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这些年来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他们之所以一步步坠入腐败的深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松了学习，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根本上迷失了方向。读书学习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增长学识，而且有利于陶冶情操、提高修养。作为党员干部，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在读书学习中把握人生道理、领悟人生真谛、体会人

生价值、实践人生追求，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要明辨是非，站稳政治立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明辨公私，坚持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不假公济私，做到执纪为民、先公后私；要明辨正邪，涵养过硬作风，做到一身清白、两袖清风。

有“笃行之”的坚定坚毅，做到学以致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因此，衡量一个人读书学习的成效，不仅要看其掌握了多少知识，更要看其能不能运用所学的知识有效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党员干部要把经世致用作为读书学习的最高境界，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靶向施治，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要把读书学习同研究解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拿出“减存量、遏增量”的应对之策；把读书学习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想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有效之举；把读书学习同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难题结合起来，走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道，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主任）

破解制约绿色发展的四个难题

□ 张志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已经凸显，制约了绿色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但在实践中，受传统行政区划影响，有些大江大河上下游跨地区“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保护和治理体系不健全，资源有偿使用、生态保护补偿等工作机制尚未有效落实，排污权、碳汇交易、水权交易市场化程度不高，制度“红利”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影响了上游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政绩考核机制有待完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但目前看，考核地方发展仍过于注重GDP，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不完善、考核权重过低，考核结果还没有真正

纳入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保护开发矛盾需要化解。在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在最严格的环保督察大背景下，刚性政策容易导致执行“一刀切”，在共性和个性、整体与局部、时间与空间、保护与开发等关系的处理上，未能对生态恶劣和生态富集地区实行差异化对待，“一刀切”政策对生态富集地区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

关键要素支撑比较落后。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开放程度不高、人才流动不畅、资金支持不足等问题尤为突出，交通、人才、资金等关键要素的缺乏严重制约了绿色转型和长远发展。这些地区基础设施方面往往公路等级和路网密度低，高铁、高速、机场建设严重滞后，人流不通、物流不畅，导致“好资源走不出大山”，也抑制了外界对优质资源的开发和消费。人才方面，硕士、博士等高端人才更是稀缺。资金方面，国家生态方

面转移支付扶持力度不大，投入不足，生态建设项目因税收贡献率低、利润率低，引进第三方治理的难度很大，多数生态环保项目如黑臭水体治理、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理等均采取PPP模式，未来发展受限。

针对以上问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进一步处理好保护优先与开发利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政府主导市场推动与公众参与、约束与激励等方面的关系，推动绿色发展。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在生态补偿方面，健全跨流域和跨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按照破坏者、使用者、受益方付费等原则，积极推行市场化生态补偿。同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流域等关键生态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转移支付“供养”实现重点区域保护。在政策执行

方面，统筹处理好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在总体空间布局上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政策，但在小的空间布局上建议考虑不同地区生态、产业等实际情况，对生态贡献较大的地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不搞“一刀切”；在时间进度上，也应考虑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的长期性，建议给予产业转型升级时间，实行限制性开发、递进式退出，避免地方经济断崖式下滑。在发展考核方面，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把“生态红线”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探索构建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考评指标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在环境资源管理和权益制度方面，健全完善操作性强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碳排放交易制度，调整优化排污权、碳汇交易、建设用地等指标分配机制，并优先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

试点。

进一步拓宽绿色发展通道。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绿色消费与绿色生活之路，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支持发展生态高效农业、生态休闲旅游业、生态智慧服务业等“生态+”美丽经济，培育大健康、大旅游、大服务、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新业态，做大做强绿色生态经济。同时，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促进地原生态、绿色、特色产品的生产流通，提升品牌影响力、产品辐射力和附加值。

进一步加强要素支撑。基础设施方面，加大老少边穷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高速、高铁和机场立体化交通建设，提升互联互通能力。开放方面，支持设立对外边境口岸、与边境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共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等，提高对

外贸水平。人才方面，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急缺人才到老少边穷地区创业发展。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常态化机制化开展双向交流。扩大重点生态地区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结对子”帮扶体系，增强地方自主培养和“招才引智”效果。

进一步强化监督问责。重点在约束、激励上下功夫，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机制。严格执法监督。在完善排污许可制度、加强在线监控、建立黑名单、推进信息公开等方面下功夫，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和惩罚力度，对踩红线、闯雷区、突破监管制度的责任主体严格追责，对各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严格督察问责。鼓励各地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机制，推动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追责。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代际公平的应有之义。